

# 历史精英图谱

历史人物品藻

汗青◎著



人文大家张颐武教授  
《百家讲坛》明史权威毛佩琦教授

联袂推荐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
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& Economics Press

# 历史精英图谱

历朝人物品藻

汗青◎著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
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& Economic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精英图谱/汗青著. —成都: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,2015.5  
ISBN 978 - 7 - 5504 - 1853 - 0

I. ①历… II. ①汗… III. ①历史人物一生平事迹—中国  
IV. ①K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64377 号

## 历史精英图谱

LISHI JINGYING TUPU

汗青 著

责任编辑:张明星

助理编辑:文康林

责任校对:李 筱

特约编辑:孙明新

封面设计:李尘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封俊川

出版发行	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(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)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 bookej. com">http://www. bookej. com</a>
电子邮件	bookej@ foxmail. com
邮政编码	610074
电 话	028 - 87353785 87352368
印 刷	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	145mm × 210mm
印 张	8. 875
字 数	195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504 - 1853 - 0
定 价	35. 0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真实的历史，总是隐藏在各种各样被拆开裁减过的文字以及出土的残简碎片里，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。但是，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，去揭示历史的真实。

# 目 录

## 上篇：魏晋三国夜谭

-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——从刘备托孤与《出师表》及北伐、  
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 / 3
- 关羽是否好色及其叛曹归刘的原因 / 32
- 关羽世系以及其子平、索略考 / 42
- 狼子野心、残暴少谋、虚负勇名的“锦马超” / 47
- 华佗之死的另一种说法 / 56
- 飞将军中原绝舞——能文善武的悲剧豪雄吕布 / 62
- 赵云不是五虎将 / 85
- 周公瑾与汉末战乱之局 / 92
- 论诸葛孔明、魏文长子午谷之谋及魏文长之死 / 96
- 导致天下三分的罪魁祸首贾诩 / 102
- 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 / 107
- 武林高手曹丕及武术杂谈 / 125

三国时期的武侠谋士虞翻 / 135
三国中的刘岱到底有几个 / 141
从诸葛氏一门把掌魏、蜀、吴三国的军政大权说起 / 145
诸葛亮没有杀马谡 / 149

## 下篇：历朝人物品藻

数点梅花亡国泪 / 157
冲冠一怒为红颜 / 185
司马相如的清高 / 197
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行为及学术思想之影响及其他 / 203
华夏文学中兴的奠基者汉灵帝 / 238
辛稼轩《水龙吟·过南剑双溪楼》词中的几个典故 / 242
中国“第一”丞相 / 249

## 外篇：魏晋风度及药石与春药及性之关系 / 259

上 篇

魏晋三国夜谭



#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

——从刘备托孤与《出师表》及北伐、  
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

公元 223 年，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，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，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、张飞随即接连身亡，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，最后在白帝城病故。

刘备病危之时，召丞相诸葛亮、尚书令李严托孤，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。期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，据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记载是这样的：

章武三年春，先主于永安病笃，召亮于成都，属以后事，谓亮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亮涕泣曰：“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！”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：“汝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。”

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，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，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。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《出师表》，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为“千古第一人臣”的典范事例和佐证。

对此，我是有不同看法的。

诸葛亮，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，其面目绝非像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，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力和实力，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，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、百姓在内，莫不如此。

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。

白帝托孤，刘备对诸葛亮说的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”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“鞠躬尽瘁”，既不是刘备首创，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。远的不说，在三国早期，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张昭传》：

策谓昭曰：“若仲谋不任事者，君便自取之。正复不克捷，缓步西归，亦无所虑。”（张昭）上表汉室，下移属城，中外将校，各令奉职。权悲感未视事，昭……乃身自扶权上马，陈兵而出，然后众心知有所归。

此时孙权年约十九，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，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。但孙策死的时候，正值各路军阀混战、孙策势力东征

西讨乘机扩张之时，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，显然比不得早已扎实根基的蜀汉政权，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，其“上表汉室，下移属城，中外将校，各令奉职。权悲感未视事，昭……乃身自扶权上马，陈兵而出，然后众心知有所归”等一系列的举动，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，要重要得多。而论地位，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亮之于蜀汉，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、张在前，后世人等独推昭烈、孔明而漏桓王、子布，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。这掠人之美的举动，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。因此认真说起来，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，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。

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，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，还有一个李严在侧。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，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，因此托孤于诸葛亮、李严二人，并非仅仅是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，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。

我们知道，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：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，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，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。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未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，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，所虑不大，这一点，我们从《三国志》的传记就可以知道。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，列传中本地人士也才十九人，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，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，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。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、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。

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，关、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，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。而在那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，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歿以后，这三者之间的矛盾

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，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毫无顾虑的。

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，那诸葛亮也只有以“涕泣曰：‘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！’”这样的态度，来明确地表示他唯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在那个年代里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“好”的。但是如此一来，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，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，背主食言的骂名，在政治、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“不臣不忠不义”的罪名，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。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，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，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。

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，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。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，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，充分表现了他出色的军事和政治能力。相比较而言，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，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，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：

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；以严为中都护，统  
内外军事<sup>①</sup>。

实际上，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（222），就已经把

---

① 《三国志·蜀书·李严传》。

李严拔为尚书令，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。由诸葛亮行丞相事，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，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，以免有一方坐大。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力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，也让我们相信，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，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力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。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，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，并借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，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，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，而不是提防。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、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力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，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，并且命其“统内外军事”，再联系“君可自取”的言语，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、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。

但在另一方面，作为君主的刘备，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。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，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，那就是他是南阳人，与“诸葛公侨客兹郡，有乡党之分”，因此刘备希望他二人可以多点“必能协规”的可能性<sup>①</sup>，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，以应付他身歿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、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，进一步巩固蜀汉政权。

遗憾的是，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，使他并不愿意看到李严与他分享权力，甚至极端地不愿意李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。

两个托孤重臣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，尤其李严还是“统内外军事”这样一个相当于三军司令的人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三国志集解》。

物。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，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，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（223）“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，是岁通好”<sup>①</sup>后，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“统内外军事”、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，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但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李严却于建兴四年（226）春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，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力中心的首都成都。

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，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，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负面效应，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，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，最后逐渐被人遗忘。而他还不至于也不会敢想去自立为王，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。从他后来曾“更成大城，周回六十里……求以王郡之巴州，丞相诸葛亮不许”<sup>②</sup>的举动来看，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力中心的。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，那只好退而求其次“以王郡之巴州”，当然相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，因此这也许仅仅是他的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力中心成都的，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，蜀汉举国上下唯诸葛公一人而已。

他们两个照后世的称谓，乃是“顾命大臣”，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权力分配上讲，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。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，李严就已被撇在了一边：

---

① 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。

② 《华阳国志》。

建兴元年，封亮武乡侯，开府治事。顷之，又领益州牧。政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。<sup>①</sup>

建兴元年，封（李严）都乡侯，假节，加光禄勋。<sup>②</sup>

同是托孤重臣，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，现在晋封乡侯，并且开府、领益州牧，其中的开府、领益州牧，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，并成为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，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，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、假节，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，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。

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，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，从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《出师表》中，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权独揽、权倾朝野，明显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，甚至还表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，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廷权力斗争的激烈状况。

他在《出师表》中，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，形势严峻，而后话锋一转道：

诚宜开张圣（听）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

---

① 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

② 《三国志·蜀书·李严传》。

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

这其中的“宫中府中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”一说，就把刘禅的“宫中”和他开府的“府中”归成了“俱为一体”，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。然后说“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”，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“开府”后的幕府来管，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。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，那就是“内外异法”了，那么“陛下”你就有不“开张圣听”，不“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”，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”，“偏私”并且不“平明”的嫌疑。我相信在看见诸葛丞相罗列了这么多不答应将会产生的罪状之后，刘禅大约是不敢不应的。这些话更像是一个上司在教训属下，哪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，然而却是出自诸葛亮这样一个被称为“一身唯谨慎”的“千古第一人臣”之口，难道不奇怪么？

只是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，要刘禅将宫中事体交给他的幕府处理后，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“为督”，掌管京师的近卫军，说只要“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陈和睦，优劣得所”。此前执掌皇室保卫任务的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，刘备以赵云“严重，必能整齐，特任掌内事”，在进成都后将其升为翊军将军，翊，卫也，依然是刘备的头号保镖兼近卫军统领。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，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，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，但是联系《出师表》的前后语义和当时形势，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目的在内。“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

理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。”此话又显有所指，只是到底是在说谁，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了，不过这也是拜诸葛公不设史官所赐。

说到不设史官，问题又来了。我想以诸葛亮的“达于为政”和其思维之周密，以及“杖二十以上亲决”的精细作风，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。“国不置史”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，便是在蜀亡以后，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，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，奉命修编的《三国志》里也唯有《蜀书》因为“行事多遗，灾异靡书”，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，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，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<sup>①</sup>。倘若说在刘备时期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，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，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，并且在拥有刘巴、秦宓、谯周、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、史学人才情况下，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“国不置史”，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“犹有未周”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，而是要从“行事多遗”这个角度去看，多少会令人疑惑其“国不置史”的目的何在。

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“建议”外，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。

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  
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愚以为宫中之  
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能裨补阙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三国志·蜀书·后主传》：“……又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，是以行事多遗，灾异靡书。诸葛亮虽达于为政，凡此之类，犹有未周焉。”